

玉石之路与华夏文明的资源依赖

——石峁玉器新发现的历史重建意义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 阐发中华文明起源的难点, 在于寻找从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过渡契机, 说明中华版图从新石器时代多中心分立格局(“满天星斗”说)到有史以来的一元中心格局(华夏国家)的转换及动因。青铜时代商周国家建构和意识形态所必须的青铜器生产, 及其所需铜矿资源依赖问题, 已有充分讨论, 而先于青铜时代的玉器时代之资源依赖, 只能以考古新发现为依据, 聚焦到形成华夏礼乐文化之源的早期玉礼器生产和使用。中心与边缘的早期互动体现为东玉西传(以玉石神话信仰为核心的玉文化传播)和西玉东输(玉料资源的传播), 探讨先于丝绸之路而存在的玉石之路, 至关重要。2012年石峁遗址古城及建筑用玉器的发现, 使得黄河对华夏文明起源的作用得到新审视: 黄河不是作为灌溉农业的水资源, 而是作为西部玉石资源调配之漕运交通线而发挥作用的。

关键词: 夏文化; 玉石之路; 文明起源; 资源依赖; 新黄河摇篮说

中图分类号: K876.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095(2013)06-018-09

一、寻找夏文化: 重建神圣符号物叙事链

从20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到新世纪以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伴随着考古新发现, 重建国家早期历史脉络的重大学术研究不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同时也形成若干疑难点, 其中最难获得突破的难点之一是, 如何认识夏文化的源流与都城所在, 找出中原国家形成的雏形。在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2009~2012)前夕, 笔者完成的前期准备工作是2008年出版的《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一书。该书从神话历史视角审视玉文化从周边向中原的运动, 初步探讨晋南的陶寺文化、西北的齐家文化和中原二里头文化三者的关联, 希望从中窥测到奠定四千年来西玉东输

文化现象的玉石之路的形成线索, 找出文明诞生前夜西北文化与中原文化互动的主要脉络^{[1]155-160}。当时未能解决的两个困惑是: 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玉礼器萌芽(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和陶寺文化玉礼器体系(玉璇玑、玉璧、玉琮组合)是如何西传并影响到齐家文化玉器生产的? 齐家文化玉器又是通过怎样的路径和中原二里头文化玉器发生关系的?

现在, 时隔五年, 陕北的石峁古城(图1)及其玉礼器体系的情况首次得到年代学的证明, 无异于给以上的两种联系找到关键的时空中介点。简言之, 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际在黄河东岸谷地缓慢形成的玉礼器文化, 在山西襄汾陶寺文化衰亡后转移或传播到黄河西岸并北上, 在河套地区的石峁遗址获得空前的发扬光大, 于4300年前形成以大件的玉璋和玉

收稿日期: 2013-07-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ZD100)

作者简介: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图1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龙山文化古城之东门，
2013年4月摄于考古工地

刀为主导器形的玉礼器新体系，用于城墙建筑的辟邪防御，并再度向西北和南方传播，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齐家文化玉器（4 000年前）与二里头文化玉器（3 800年前）^[2]。

从理论上讲，阐发中华文明起源的难点，在于寻找从龙山文化到夏文化的过渡转移契机和进程，这也就意味着寻找到使得中华文化地理版图从新石器时代多中心分立格局（所谓“满天星斗”说）到有史以来的一元中心格局（华夏国家）的转换及其动因，即从多地域的地方性政权到一个具有充分统治力和号召力的中原国家政权雏形样态，这种雏形样态虽然在距今4 000年之际仍然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萌芽期，却给后来的商周国家奠定了基本的中原区辐射周边地域的四方一心格局，体现为《山海经》中的五方空间的同心方式国家地理展开模式，又体现为《禹贡》等典籍所载的五服制的、职贡图的范式模型。如果说，青铜时代黄河流域商周国家建构其政权和意识形态所必须的青铜器生产，及其所需要的铜矿资源依赖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的充分注意^[3]，那么，探讨四千年前早于商周青铜开采和生产的中原政权主导性资源依赖的情况，就不能诉诸文献记载，只能以考古新发现的实物为依据，把目光聚焦到先于青铜礼器数千年就形成华夏礼乐文化之源的玉礼器生产和使用情况上来^[4]，这方面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关注。原因是华夏玉文化发展史的史前阶段，玉器生产的玉料取材从多点开花的各地区地方

玉矿资源^[5]，转移和集中到一点独大的新疆和田玉资源，其过程和完成时间问题，学界一直没有得出较为确切的新认识，尚处在自说自话和众说纷纭的状态。

笔者将史前用玉的多点开花格局向中原国家用玉的一点独大格局之转变过程，概括为先有“北玉南传”、“东玉西传”后有“西玉东输”的两阶段过程^[6]。前一阶段在距今四千年前基本完成，以玉礼器文化自东向西传播，进入河西走廊为标志；后一阶段则以距今四千年为开端，通过齐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的互动，将西北地区的新疆和田玉及甘青地区的祁连玉源源不断地输送中原。两大阶段的交汇点就在距今四千年之际，这也正是夏文化发展为华夏第一王朝的年代^[7]。为了求证这一资源大转移的过程，仅靠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资料都显得捉襟见肘。结合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玉器新发现，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于2013年6月在陕西榆林召开“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通过对陕北地区龙山文化玉器、玉料的实物观摩和现场讨论，与会专家达成基本一致的认识：在龙山文化晚期和齐家文化时代，即距今4 000年前后，真正开启西玉东输的华夏国家资源供应模式，河套地区的古代方国政权起到重要的中转作用。而且一旦形成就推展到商周以后的历朝历代，和田玉输入中原的过程从上古甚至一直延续至今日，其间发生变化的只是运送的规模和具体输送路线。

2012年以来的考古新发掘情况表明，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史前石城及其建筑用玉现象，昭示出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河套地区龙山文化聚落社会^[8]，她以其强大的地方性方国政权统治形式，在距今4 300年至4 000年之际，大批量地生产和使用玉礼器玉兵器^[9]，在当地迄今没有找到玉料矿藏资源的条件下，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政权很可能同时充当着史前期东玉西传（玉教观念和玉文化的传播）与西玉东输（玉石资源的传播）的双重中介作用，石峁玉器群在今日的重现天日，对考察华夏文明发生期的玉石资源依赖与具体运输路线图，其意义非同小可。

二、《管子》“尧舜北用禹氏之玉而王天下”解

华夏国家形成期的资源依赖情况,在先秦文献中有重要线索提示。如《管子》一书中向统治者提出的政治经济话语,就有反映远古时期中原王朝政权之资源依赖的说法。《管子·揆度第七十八》:

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藪,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禹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10]159}

管子明确说到尧舜王权建立的首要条件是“北用禹氏之玉”。此话值得注意者有二:其一是表明玉料来自北方;其二是表明掌握玉矿资源的人群是外族的禹氏之人^[11]。所谓“禹氏”何许人也?王国维和日本的江上波夫等以为就是游牧在北方草原与河西地区的大月氏^[12],徐中舒以为是有虞氏,相当于印欧人种^[13]。至于尧、舜圣王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禹氏掌控的北方玉料,不得而知。如今参照石峁玉器大量使用的情况判断,玉料或许是通过黄河水路自北向南运送到中原地区的,河套地区史前玉器的批量发现为此提供了新线索。但是玉料的原产地未必出自北方,而是出自西北方,即祁连山-昆仑山一线。禹氏活跃在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所以中原人和东方齐国人印象中的玉料是来自北方的,并不知道其究竟原来出自西方。《管子》书中同一篇再次说到玉矿:

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璆璠,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汝、汉水之右衢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禹氏边山之玉,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10]162}

管子所说的边山之玉,是作为当时国家重要战略资源而提及的。边山具体的地理距离,下文有所交代:“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黄金起于汝汉水之右衢,玉起于禹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途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高下中币,利下上之用。”在《轻重甲》篇中又一次提及玉矿,表明尧舜时代获得北方玉料的方式之一,是靠朝贡的交换方式:

禹氏不朝,请以白璧为币乎?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繆琳、琅玕为币乎?故夫握而不见于手,含而不见于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后,八千里之吴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后,八千里之禹氏可得而朝也。”^{[10]163}

从珠玉资源的输送方向看:边缘性的资源对中央政权的供给是多方向运动的:玉石,自北而南;珠,自南而北。两种资源供给路线图大致勾勒出早期华夏国家的地域控制范围。即北至边山,南抵江汉。石峁玉器的生产和使用的具体地理位置,表明这个权倾一时的巨大方国,正是处在中原王朝以北的稍远地区,使得“尧舜北用禹氏之玉”的判断得以落实到4300年前的河套地区北方豪强势力。虽然其距离中原的里程远没有“八千里”之遥,所谓“八千里”之说,一定包括禹氏从新疆昆仑山向东输送玉石的全程距离吧。

在当今国际考古学界,受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大范围空间系统中的文化相互作用关系:“关注区域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其中周边区域为核心区域提供原料,而核心区域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所有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受制于它们在该系统中作用变化的影响。菲利普·科尔认为,古代的世界系统很可能仅在表面上类似现代的世界系统。特别是他声称,核心和周边的等级关系很可能远不如现代的稳定,而政治力量在调节这种等级关系上,可能发挥着更显著的作用。个人和群体的迁徙也再次被讨论。而最重要的是意

识到,社会与相邻的社会而言,就像它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样,并非一种封闭的系统,一个社会或文化的发展很可能受制于它所置身其中的一个较大社会网络,或受其影响。人们也日益意识到,也值得对主导这些进程的规则本身进行科学的考察。”^{[14]331} 华夏文明起源期形成的数千公里资源供应链,充分表明这个文明国家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出自边缘地区,对此资源的需求却不是出自边地,而出自中原核心地区。这种资源依赖格局还能够说明:这一文明国家为什么直到今日都一定要把河西走廊以西地区的不同民族视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成员,将新疆的广大地区看成统一国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华夏文明之黄河摇篮说的更新

在关于文明起源的理论中,有所谓“大河流域”说。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的经典著作《技术与文明》一书指出:

文明总是沿着大河的流域在发展:黄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莱茵河、多瑙河以及泰晤士河。也许海洋两端的文明算是某种例外,在那里海洋代替了河流。各种早期的技术就在这种原始的流域背景下发展着。^{[15]59}

从世界最古老的五大文明古国情况看,芒福德列举的几大河流还应该加上印度河,这样即可完满地每一个古文明的发生落实到一条母亲河的孕育。依次分别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合称两河流域)孕育的苏美尔文明和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孕育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孕育的印度文明;黄河流域孕育的华夏文明。由于大河流域与文明古国发生的对应性十分醒目,以至于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20世纪中期提出一种新的文明起源理论:挑战-应战模式下的水利灌溉说。即每一文明古国的起源都遵循着人类应对大河泛滥的环境挑战需求,通过人工建设水利设施而实现灌溉农业,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伟大的城市文明。仔细地而不是笼统地辨析华夏文明起源与黄河的关系,我们看到华夏文明初始期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利用黄河之水利建立大规

模灌溉农业的情况。黄土地的生态特性选择的唯一本土性粮食作物是耐干旱的小米,这样在外来输入的小麦进入黄河中游地区以前,也就不需要什么灌溉农业。这个事实意味着华夏文明起源的黄河摇篮说需要重新界定理论方向:黄河不是作为集约化农耕生产的水利灌溉条件而发挥拉动文明起源之作用的,穿越整个黄土高原区的黄河,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河流之一,主要是作为中原文明所依赖的外地资源的水路运输渠道而拉动文明起源的。仅此一个微妙的区别,就让我们不能认同魏特夫的水利说文明起源的普世论调,需要提出符合国情的中国人自己的华夏起源观。玉石之路黄河段的研究课题,将会带来研究格局的更新与文化观念的更新^[16]。从《尚书·禹贡》到《水经注》,华夏九州大地上的河流怎样从文明起源期就承担远距离的资源调配作用,值得结合考古新发现情况做出全盘的考量。

东亚的青铜时代到来之前,是不是先有一个玉器时代作为铺垫呢?铜矿和其他金属矿石起初被先民发现之际,其实也都是某种特殊石头。据此可以说冶金术的起源确实以石器时代切磋琢磨的攻玉实践为前身。如果要在漫长无比的石器时代中划分出早段无玉器时代和晚段有玉器时代,那么原有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划分就不够用了,需要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青铜时代初期之间,重新划分出一个玉器时代。对于华夏文明的特殊文化基因而言,玉器时代的孕育作用至关重要。问题在于阐明玉器从石器中被筛选而出的观念因素是什么。刘易斯·芒福德的说法是:

在挖掘、采石和采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发现石英的露天岩层,也同样可能展现黄金;黏土河岸的河流中也可能闪现一颗或两颗金粒。它们对于原始人之所以可贵,不仅是因为其稀有,而且是因为它们柔软,能延展,不易氧化,不用火就能加工。在所谓的金属时代到来之前,人们应用的是黄金、琥珀和玉石。它们受人珍重主要不是因为能制作什么,而是因为它们的稀有及奇异的性质。人们对这些稀有物质的追求与扩大食物来源或感官的舒适毫无关系:因为在发明资本主义和批量生产之

前很久,人类就已经不仅能满足生存需求,而且有更多的精力了。^{[15]67}

难道仅仅由于“稀有和奇异”就能被人珍视甚至推崇备至吗?看来至少还需要从史前信仰观念上说明问题,那就要落实到玉石神话的形成和传播。有关夏代的历史记忆中充满着各位统治者与崇玉、佩玉和用玉的传说。从鲧生禹和涂山氏生启的方式看,是石中生玉的现象之神话拟人化;从禹之玉圭和启之玉璜,到夏桀之玉门、瑶台,可以说整个有关夏代的想象都离不开玉的神话信仰,这或许并非空穴来风。国人都熟悉瑶台是华夏神话中的专名,特指掌管不死仙药的女神西王母的居所,又称瑶池。夏桀建瑶台,莫非要在人间营造一个模仿昆仑山的神仙永生世界?石峁石城发掘出4000年前建筑用玉景观,让争议夏代是否存在的双方人士都会有新的思考:肯定夏代存在的一方需要探讨石峁建城用玉与夏代玉文化的关系;否认夏代存在的一方则可思索相当于夏代纪年的石峁城之民族属性与文化归属,还有其玉料的来龙去脉^[18];甚至从河套地区的方国政权统治势力及辐射规模,重新审视中原文明崛起的外来影响要素^[19],尤其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带的形成及其与中原农业文明的冲突、互动及融合^{[21]128-149}。

四、石峁玉器解读:通神、避邪的玉教神话观

笔者去年夏以来三次走访石峁的龙山文化古城遗址,从考古现场得知,有中国史前最大城市之称的石峁城有400万平米,2012年发掘清理的只是该石城的一座东门,在垮塌的墙体中发掘出六件玉器,分别是玉铲、玉璜和玉璋残件。陕西当地学者有人将石峁古城看作黄帝集团的遗址。其文章在《光明日报》刊登并引起争论。不过,从石峁城墙中木料取样的碳十四测年结果看,建城和使用的年代在距今4300年至4000年间。约相当于夏代早期及更早些的传说时代即唐尧虞舜时代,与自古相传的黄帝5000年说,尚有近千年的差距。根据以往研究经验,不宜轻易将史前考古遗址同传说的某一位古帝王直接挂钩,因为此类挂钩来自

主观猜测,容易引起持久的争议,很难证实,除非有考古发现的文字记录或其他较确实的符号系统证明。就连河南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代都城所在,至今还有争议,更不用说石峁遗址是不是黄帝群团的遗迹了。

目前更需要学界关注和解释的是:相当于夏代的四千多年前的古城墙建筑用玉现象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和古书记载中有关夏代帝王的事迹有没有对应点?如果有,又该做出何种联系和因果解释。石峁当地出古玉的名声已有半个多世纪。陕北民间一直有大量玉器外流,学界却弄不大清楚具体出处。20世纪7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戴应新先生到当地调研时,曾经通过村干部动员,一次就从石峁村民手中采集到玉器126件^{[22]228-239}。当地农民的一个说法就是玉器来自石墙的墙体。为了获取古玉,许多墙体遭到盗掘和破坏,现在残存的城墙已经十分破败和零碎。由于这一带地区本来就是明代长城分布的地区,人们也就一直以为这些藏玉的石城属于明长城残部。现在终于真相大白:这些残垣断壁是史前期的龙山文化先民修筑和使用的。该城在距今约4000年时被废弃后,并没有发现商代及其以后的建筑和遗物。这意味着石峁古城代表的是一种失落的文化。石峁的玉器生产和使用并没有在当地的后世文化中传承下来,而是传播到其他地域。可能的传播方向一是向西,进入宁夏甘肃青海地区,成为齐家文化玉器的源头之一;二是向南,成为延安和关中等地龙山文化玉器的源头,并辗转而波及影响到河洛地区二里头文化玉器及商代玉器。二里头遗址高等级墓葬出土的玉刀玉璋组合(图2),从形制和墨玉用料看,均与石峁玉刀玉璋如出一辙(图3),或可作为文化关联的很好物证。

2012年夏通过答辩的山东大学杨谦的硕士论文《商代中原地区建筑类祭祀研究》,将商代建筑仪式划分为三类:奠祭、祀墙和祀门。三种仪式中仅有祀门仪式使用玉器。如今看来,建筑仪式用玉的传统也是殷商人继承的史前文化传统。石峁古城还有一个让人惊悚的发现:城墙东门路面下和墙基外侧有两处集中埋放人头的遗迹,每处都是24个人头。头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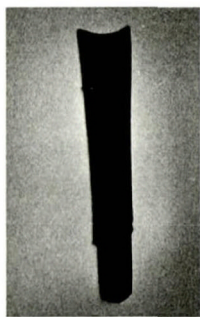


图2 二里头遗址出土墨玉璋，
2012年摄于国家博物馆玉器馆



图3 石峁遗址采集墨玉璋，
2011年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先民建造城池用砍人头的行为作为奠基礼，这和建筑用玉的辟邪目的是一致的。2012年发掘清理的只是古城地势最高处的一座东城门，就发现两处48位牺牲者的头颅。2013年6月笔者再度考察时，人头坑的数量已经增加到4个，开始发掘的东门北侧城墙基址下方，延墙体伸展的方向有新发现的两个人头坑，大坑中依然有24个人头(图4)，小坑中则发掘出6个人头。奠基用人头数量已经达到78个之多。照此推测，全城(外城墙现存长度约4200米，内城墙现存长度约5700米，合计长度将近10公里)之下不知有多少被砍的人头？这78个骷髅多为年轻女子之头，她们和石峁建城者和统治者有怎样的关系？是敌对一方的俘虏被残杀，还是同族的自愿牺牲者行为？这一切还都是谜。

辟邪的“辟”字，下方加上玉字就是代表玉礼器的“璧”，可象征精神上的通神、防御和保佑；下方加上土字就是代表城墙的“壁”，代表现实的防御和保护。避邪需要人头祭祀的情况，在中原龙山文化的建筑仪式遗迹中多有发现，但从来没



图4 石峁城基下的祭祀人头坑，
2013年6月摄于工地

有发现使用这么多人头的。辟邪用玉用金(金属)的情况，在华夏周边的少数民族建筑奠基礼上至今还能见到。联系到石峁遗址出土的玉雕人头像(图5)，以及石雕巨型人面像(图6)等，四千年前先民用玉的辟邪神话功能将呈现得十分明显。有关史前时代的石雕或陶塑人头人面等，萧兵先生均从辟邪意义上理解。他写道：

李水城《从大溪出土石雕人面谈几个问题》认为。它(即玉雕人面)确实可能是一种“护身符性质的形象化灵物”。它出现在一座儿童墓中，我们觉得就更可能是辟邪护身的“佩饰”，就好像后来的贾宝玉佩戴“通灵宝玉”，一般孩子戴“金锁”项圈、虎面佩饰一样——至于那人面所“属”还难于认定，只是可以肯定，无论是祖灵或人神造像，抑或猎获的“敌臬”造像，都具有辟除邪恶的功能。^{[2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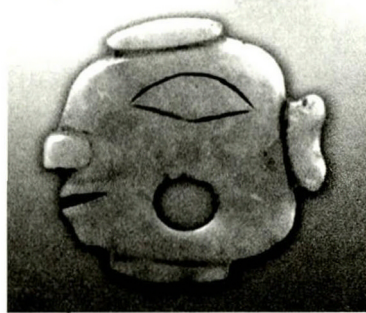


图5 石峁遗址采集玉人头像，
2008年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图6 石峁遗址出土石雕人头像,
2013 摄于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

结合石峁建城用玉器于墙壁中的情况看,《红楼梦》等文学作品表现的玉器能够辟邪护身的观念,后世普及流行于民间,其源头显然来自史前大传统的玉石神话信仰。玉器或玉质建筑物的想象,其观念原型即神话中的神仙所居之地。《穆天子传》卷三云:

天子宾于西王母,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后世文学有关瑶池或瑶台的想象再造,总是和玉界仙境联系在一起。如“仙宫莫非也寂寞,子夜乘风下瑶台”“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飞雪漫天传圣讯,速邀芳客赴瑶台”“瑶台休更觅,只此即神仙”,等等,皆是其例。夏代帝王用美玉砌成的楼台,从命名上看就是模拟昆仑山玉界的。除了瑶台之外,还有所谓“璇室”,特指饰有璇玉的宫室。“璇”通“旋”故又写作“旋室”。有一种说法认为,指装有旋转机关的宫室。《淮南子·墜形训》:“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闾阖之中。”高诱注:“旋室,以旋玉饰室也。一说,室旋机关可转旋,故曰旋室。”从石峁玉器中多见的玉璇玑的现象看,璇室的原型或许和玉璇玑本身的神话宇宙论意蕴有关,值得进一步探究。在有关夏代玉质建筑物的三种名目中,唯有“玉门”一项成为华夏文明史上著名的河西走廊地名和关口名,而且其地点就在向中原输送和田玉的玉石之路枢纽上。

玉门关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城西北 80

公里的戈壁滩上,一名小方盘城,是长城西端重要关口。现存的玉门关城垣完整,总体呈方形,东西长 24 米,南北宽 26.4 米,残垣高 9.7 米,全为黄胶土筑成,面积 633 平方米,西墙、北墙各开一门,城北坡下有东西大车道,是历史上中原和西域诸国来往及邮驿之路。玉门关为什么叫玉门关的问题,民间文学的叙事给出更加贴近上古信仰的解释:玉门关原来不叫玉门,而叫小方盘城。由于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数千里路上的主要运载工具是骆驼。骆驼队一旦进入小方盘城就卧地害病,这使押运玉石的官员十分恼火。有一位回鹘老人说:骆驼害病是由于被运送的玉石在作怪,需要为之祈祷和安抚。具体做法是在小方盘城的城门上砌一圈玉石。玉石进关时见到城上有光泽,以为仍在和田故土,就不作怪了。官员听从回鹘老人的劝说,在小方盘城城门上方砌了一圈晶莹剔透的玉石,小方盘城也就改名叫玉门关了。^[24]

根据原始信仰的万物有灵观念,草木石头等自然物都是像人一样的有灵之活物。玉石通灵的观念直接源于玉石通神的观念与长期祭祀实践。具体而言,这一套玉教信仰观念的核心在于如下几点:其一,神灵高高在上,看不到也摸不到。其二,世间稀有的玉石,即代表着下到凡间的神灵,使得遥不可及的神灵变得具体而实在。其三,玉石之所以能够代表神灵,主要因为玉石的颜色和半透明性,近似天空之体。于是先民在想象中将玉类比为天和天神。其四,用玉石于祭祀礼仪活动,就好比信仰者直接感触到超自然存在,实现人神沟通和天人沟通。其五,最初的玉教形式就是石头崇拜和石头祭祀。祭祀玉石如神在:如羌族的白石崇拜。其六,用玉石作材料,制作出象征圆天的玉礼器——玉璧,专门用于祭祀仪式。看《尚书·顾命》篇的周公祭祀、《穆天子传》的穆天子与河宗氏祭祀黄河,《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山川祭祀情况,可知华夏祭礼文化在西周时期已经完成改造升级,即以玉璧为主体的玉礼器体系。

石峁城东门山墙体中发现玉器,表明那也是四千年前古人心目中的一座“玉门”。最有参照意义的解读旁证,出自云南兰坪河西一带普米族在建筑奠基仪式上演唱的《祭中柱》歌,

其歌词云:

我们寻找一个藏金埋玉的地方
打上地基的围栏
挖了第一锄基槽
埋下了第一个基石^[25]

普米族的建筑选址讲究“藏金埋玉”之地,这样的祭祀歌词听起来像是文学性的夸张或夸饰,但是如此措辞中带出的宗教信仰意蕴不在于炫富和奢侈,而是具有祈祷和辟邪的双重作用,那就是借助于金与玉的通神作用实现辟邪驱魔之法力。可以和四千年前石峁建城者的辟邪行为——墙体中藏玉和墙基下埋人头,相提并论,相互对照和诠释。

陕西礼泉县流传的唐太宗李世民修建陵墓选址的民间传说,也有先选风水宝地,然后埋下一枚玉钱,压石为记的细节。玉钱自汉朝起就有生产和使用。但是玉钱并不能用作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而是用于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祈祷祭祀场合。建筑必须先破土,才能动工,用人做牺牲和用玉钱埋到地下,此类行为都潜含有向地鬼买地谢罪的宗教意图。玉和人头一样,具有强烈的避邪神话意蕴。此类民间口碑资料虽然产生年代较晚,但是其中体现的玉器通神通灵作用,依然可以作为第三重证据,给玉教观念支配下的华夏文化文本解读,带来必要的启迪。

参考文献:

- [1] 叶舒宪. 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M].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 [2] 叶舒宪. 关于石峁与齐家文化的关系[J]. 文博,2009(5).
- [3] 梅原末治. 中国青铜时代考[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4] 叶舒宪. 中国玉器起源的神话学分析[J]. 民族艺术,2012(3).
- [5] 叶舒宪. 丝绸之路前身为玉石之路[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3-8.
- [6] 叶舒宪. 西玉东输与北玉南调[J]. 能源评论,2012(9).
- [7] 叶舒宪. 玉石神话与中华认同的形成[J]. 文学评论,2013(2).
- [8] 戴应新. 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J]. 考古,1977(3).
- [9] 叶舒宪. 重建玉石之路[N]. 文汇报,2013-5-17.
- [10] 郭沫若. 管子集校(三)[M]//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1] 王国维. 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M]//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 浙江:教育出版社等,2010.
- [12] 江上波夫. 月氏和玉[M]//亚洲文化史研究·论考篇. 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7.
- [13] 徐中舒. 先秦史论稿[M]. 四川:巴蜀书社,1997.
- [14] 布鲁斯·特里格. 考古学思想史[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15] 刘易斯·芒福德. 技术与文明[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 [16] 叶舒宪. 黄河水道与玉器时代的齐家古国[J]. 丝绸之路,2012(17).
- [17] 叶舒宪. 玉石之路大传统与丝绸之路小传统[J]. 能源评论,2012(11).
- [18] 叶舒宪. 神木,神煤和神玉[J]. 能源评论,2013(4).
- [19] 叶舒宪. 文化传播:从草原文明到华夏文明[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1).
- [20] 叶舒宪. 西玉东输与华夏文明起源[J]. 丝绸之路(理论版),2013(10).
- [21] 吉迪. 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22] 戴应新. 我与石峁龙山文化玉器[M]//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
- [23] 萧兵. 辟邪趣谈[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24] 唐光玉(整理). 丝路的传说[M]//甘肃民间文学丛刊(第二期),1982.
- [25] 和顺昌(讲述). 祭中柱[M]//云南普米族歌谣集成,采自“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汉王科技公司,2013.

Jade Route and Depend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Resources

—Significance of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of New Finding of Shimao Jade

YE Shu-x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difficulty in elucidati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lies in the looking for the

transition moment from Longshan culture to the Xia, the Shang and the Zhou Dynasty and explain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ason from the polycentric pattern of the Neolithic Age to the monocentric pattern of Huaxia. Much has been discussed about the dependence on copper ore in the Bronze Age. While the discussion of the dependence on resources in the Jade Age, before the Bronze Age, should be based o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focused on jade production and jade culture transmission.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discuss the Jade Route, which existed before the Silk Route, because the initi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 started from the transmission of jade culture and the spread of jade material. In 2012, the discovery of Shimao relic and jade used for construction justified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Yellow River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Yellow River was not so much the water resource for irrigation as the traffic line for jade resource from Western China.

Key words: Xia culture; the Jade Rout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dependence on resources; new theory of Yellow River cradle

(上接第 17 页)

Analysis of Peculiar Development Paths in Late Ottoman Empire

WANG San-y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Westernization reforms in late Ottoman Empire, the economy grew, the society further opened up and westernization enhanced. However, there was a reverse trend that the road to Constitutionalism was blocked as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was taken back by Sultan and the society went back to the autocracy under Abdülhamid II. The *Young Turks* continued the retrogression by new dictatorship. Jud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s, the *Tanzimat* was continued and deepened under the autocrac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vinces was strengthe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rails and roads. Foreign trade expanded, foreign invest increased and the backward empire was getting closed to the world. Many schools, banks, orphanages, telephone offices and hospitals were built, which obviously showed the advancement of society. The people were not easily deceived by those in power as they had been in the past. These posed a challenge to Sultan, who was not willingly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his power should be restricted, administrating the whole empire. He tried his best to maintain his rule, but the revolutionary seeds had already been rooted. Unfortunately, the arbitrary of the central figures in the *Young Turks* led Ottoman Empire to war, which resulted in the collapse of the Empire.

Key words: late Ottoman Empire; reform continuity; social opening; political retrogress